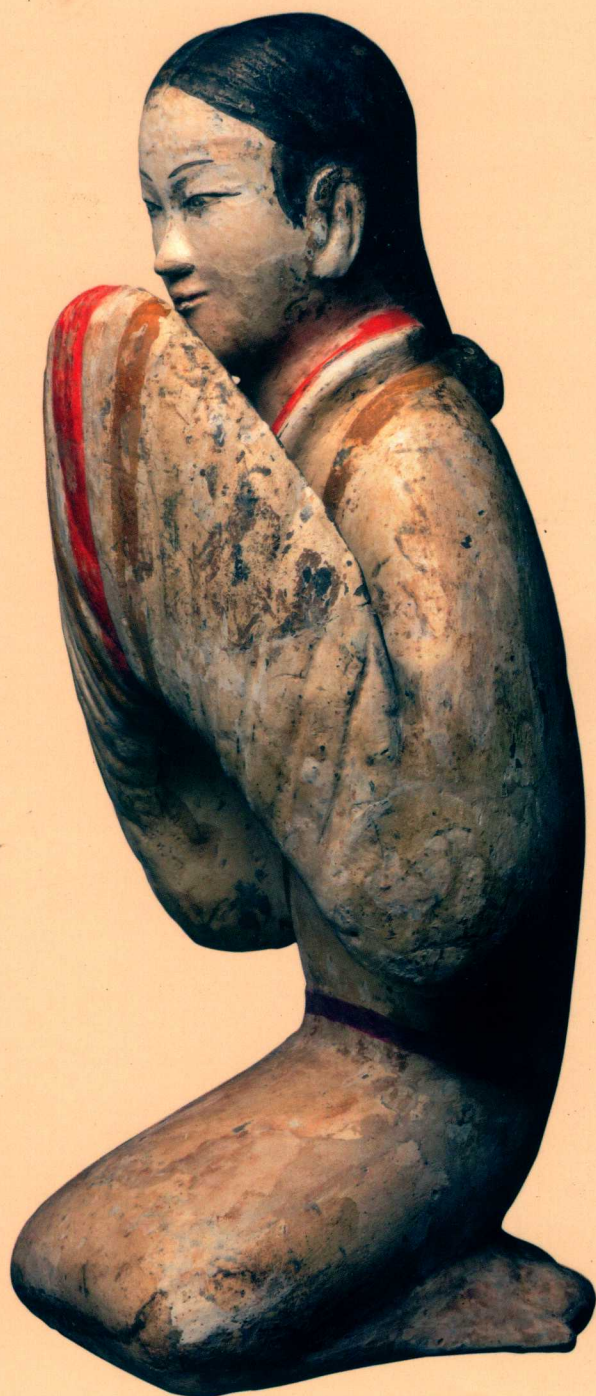


大漢 地下 王朝

连旭 摄影
张文文 唐群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秦汉新丝路

大漢地下王朝

连旭 摄影

张文文 唐群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秦汉新丝路

总策划、总监制：李元君

学术顾问：马永赢

特约编辑：王光灿

责任编辑：宫 共

责任校对：黄文魁 吕 飞

责任印制：安晓贤

选题责任方： 秦汉新丝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地下王朝 / 张文文, 唐群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01-019717-3

I. ①大… II. ①张… ②唐… III. ①帝王—陵墓(考古)

—西安—西汉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 K878.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8385 号

大汉地下王朝

DAHAN DIXIA WANGCHAO

连 旭 摄影 张文文 唐 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8

字数: 50 千字

ISBN 978-7-01-019717-3

定价: 1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004 前 言

031

032 一

汉高祖长陵

刘邦（前 256—前 195）

1. 刘邦——大汉王朝的缔造者
2. 长陵高处望长安
3. “徙齐诸田”于长陵
4. 附葬垒垒尽列侯
5. 与秦俑各具风采的汉俑军阵

061

062 二

汉惠帝安陵

刘盈（前 210—前 188）

1. 刘盈——柔儒的少年天子
2. 生前郁郁，死后哀荣

073

074 三

汉文帝霸陵

刘恒（前 202—前 157）

1. 刘恒——“文景之治”的奠基者
2. 霸陵为何独一无二
3. 江村大墓：霸陵是否另有真身
4. “顶妻背母”的仁孝传奇
5. 霸陵陪葬墓

091

092 四

汉景帝阳陵

刘启（前 188—前 141）

1. 刘启——西汉盛世的奠基者
2. 一座承上启下的帝陵
3. 庞大的陪葬墓园
4. 在地下博物馆零距离触摸历史

167

168 五

汉武帝茂陵

刘彻（前 156—前 87）

1. 刘彻——武威远播的皇帝
2. 厚葬典型为茂陵
3. 天下高髻齐聚茂陵
4. 星罗棋布的陪葬墓
5. 茂陵石刻群——大汉开疆拓土的写照

223

224 六

汉昭帝平陵

刘弗陵（前 94—前 74）

1. 刘弗陵——天妒英才
2. 争议千年的帝后陵

231

232 七

汉宣帝杜陵

刘询（前 92—前 49）

1. 刘询——西汉的中兴皇帝
2. 杜东原上的帝后陵
3. 杜陵南园——许皇后陵
4. 富冠京师杜陵邑

245

246 八

汉元帝渭陵

刘奭（前 75—前 33）

1. 刘奭——柔仁好儒的皇帝
2. 一座没有陵邑的帝陵
3. “二十八宿墓”

257

258 九

汉成帝延陵

刘骜（前 51—前 7）

1. 刘骜——耽于酒色的皇帝
2. 延陵与昌陵
3. 名位难考的陪葬墓

269

270 十

汉哀帝义陵

刘欣（前 25—前 1）

275

276 十一

汉平帝康陵

刘衎（前 9—公元 5）

285

286 编后记

大漢地下王朝

连旭 摄影
张文文 唐群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秦汉新丝路

目 录

004 前 言

031

032 一

汉高祖长陵

刘邦（前 256—前 195）

1. 刘邦——大汉王朝的缔造者
2. 长陵高处望长安
3. “徙齐诸田”于长陵
4. 附葬垒垒尽列侯
5. 与秦俑各具风采的汉俑军阵

061

062 二

汉惠帝安陵

刘盈（前 210—前 188）

1. 刘盈——柔儒的少年天子
2. 生前郁郁，死后哀荣

073

074 三

汉文帝霸陵

刘恒（前 202—前 157）

1. 刘恒——“文景之治”的奠基者
2. 霸陵为何独一无二
3. 江村大墓：霸陵是否另有真身
4. “顶妻背母”的仁孝传奇
5. 霸陵陪葬墓

091

092 四

汉景帝阳陵

刘启（前 188—前 141）

1. 刘启——西汉盛世的奠基者
2. 一座承上启下的帝陵
3. 庞大的陪葬墓园
4. 在地下博物馆零距离触摸历史

167

168 五

汉武帝茂陵

刘彻（前 156—前 87）

1. 刘彻——武威远播的皇帝
2. 厚葬典型为茂陵
3. 天下高髻齐聚茂陵
4. 星罗棋布的陪葬墓
5. 茂陵石刻群——大汉开疆拓土的写照

223

224 六

汉昭帝平陵

刘弗陵（前 94—前 74）

1. 刘弗陵——天妒英才
2. 争议千年的帝后陵

231

232 七

汉宣帝杜陵

刘询（前 92—前 49）

1. 刘询——西汉的中兴皇帝
2. 杜东原上的帝后陵
3. 杜陵南园——许皇后陵
4. 富冠京师杜陵邑

245

246 八

汉元帝渭陵

刘奭（前 75—前 33）

1. 刘奭——柔仁好儒的皇帝
2. 一座没有陵邑的帝陵
3. “二十八宿墓”

257

258 九

汉成帝延陵

刘骜（前 51—前 7）

1. 刘骜——耽于酒色的皇帝
2. 延陵与昌陵
3. 名位难考的陪葬墓

269

270 十

汉哀帝义陵

刘欣（前 25—前 1）

275

276 十一

汉平帝康陵

刘衎（前 9—公元 5）

285

286 编后记

前 言

在陕西省咸阳市北有一处绵延百余里的黄土台塬，今天的人们习惯称其为“咸阳原”。这里是西汉帝国的皇家陵寝所在。两百多年来，西汉 11 位皇帝中，就有 9 位皇帝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长眠之所，分别是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汉元帝刘奭的渭陵、汉成帝刘骘的延陵、汉哀帝刘欣的义陵、汉平帝刘衎的康陵，而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则因为其他原因另葬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即霸陵和杜陵，与咸阳原上的 9 座帝陵隔着渭水遥遥相望，共同组成了庞大的西汉帝陵群。在咸阳原上的 9 座西汉帝陵中，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附近，均设置了陵邑，迁徙大批关东贵族、豪富入居其中，咸阳原又因此得名五陵原，一时间人文荟萃，成为西汉时期全国最繁华的地区，焕发出勃勃生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如今位于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辖区内的这 9 座帝陵，高大的封土堆一字排开，再加之大大小小的陪葬墓拱卫在其周围，绵延百里，气势恢宏，形成了中国最为壮观的帝陵遗址带，其规模和规格堪称世界之最，素有“东方金字塔群”之美誉。

雄伟的西汉帝陵，不仅仅是西汉帝王的埋葬之所，更折射出西汉两百年的兴衰变迁，大一统的汉帝国四百年来的辉煌历史。读大汉帝陵，知帝国兴衰。纵览西汉一朝的历史，皇位的更迭，国运的起伏，伴随着一座座帝陵的耸立，可谓波澜壮阔、一波三折，历史的激流在无数个峰回路转中一路前行。这片帝王陵寝，也成为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高光地带，一把理解国运兴衰的关键之匙。

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为了使国家从秦末乱世的凋敝和楚汉战争的破坏中走出，刘邦总结了秦历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重建中央集权制度，但在政令上宽简舒緩，力避秦之苛刻急切；又推崇黄老之术，确立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以柔制刚，以守为攻，逐步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的轻徭薄赋政策，重视农业，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国力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继续休养生息，韬光养晦，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并且以身作则，反对穷奢极欲。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做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才得以出现。

汉武帝即位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国力的逐步雄厚，开始锐意进取，积极有为。他

励精图治，胸怀远大，文治武功显赫，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又重视文教，唯才是举；对外则多次发动对匈奴的征战，加强边塞防御，并移民突边，保证了边境的平安和道路的畅通；他又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些举措大大增强了西汉帝国的国力，扩大了汉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汉武盛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时期。西汉在经历了武帝在位后期的危机后，又于昭宣二帝在位时期再次复兴，此后才走向衰落，最终亡于王莽篡位。

可以说，西汉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长达两千年的政治制度、疆域基础、文明模式等诸多方面，并以其在物质文化上和精神文化上的伟大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也居于领先地位，堪称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朝代之一。

在汉朝，中华民族的概念第一次得以形成，而且在秦朝大一统基业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些成就，基本都是在西汉完成的。汉武帝北征匈奴，收复了匈奴占领的秦朝故土，又南下统一两越，其领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东北部分区域外，几乎包括现在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大大超过前朝秦朝的领土，建立起中原王朝的初步形态，此后几经繁衍变化，形成今天的疆域。西汉境内的各族人民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中走向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汉巩固发展了以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以及奠定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这一政治思想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西汉建立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过对人才才能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只看其出身与地位，来吸引真正的人才。这一制度为后世朝代所沿袭和发展。而肇始于秦的郡县制也是在西汉时得到完善和巩固，并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西汉也是中国历史上美术、诗歌、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空前的繁荣时期。以霍去病墓的石雕群为代表的西汉石雕，因势象形，粗朴雄浑，简括而又传神地表现出虎、牛、马、熊等艺术形象，反映出汉代艺术“气魄沉雄博大”（鲁迅语）的艺术特点；还有以四神瓦当和文字瓦当为代表的瓦当艺术，融书法、绘画、雕刻、工艺于一体，达到了审美和实用的高度统一，既能反映出西汉时的“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独特的哲学和宇宙观念，又表现出盛世时期强健向上的时代风貌。西汉汉赋和乐府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淮南子》则是哲学史上的丰碑，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而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深远，历朝正史皆采用此种体裁撰写，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鲁迅语）。西汉时期的文化繁荣，得益于西汉历代帝王采取的相对开明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武帝时期，在思想上重视儒家的同时又能不偏于一端，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

西汉进一步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包容的文化基因，西汉也是汉人、汉民族、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一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被定名为“汉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世界，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此外，西汉时期开拓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间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至今日，这种文明、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和时代精神，仍在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上延续着。

大一统时代的西汉帝国，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不胜枚举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帝国缩影和见证的帝陵，又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帝陵文化传统。从西汉帝陵的规划布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帝国思想的痕迹，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

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了“陵墓若都邑”的说法。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已经演化成为约定俗成的丧葬制度。因此，作为帝国统治者的皇帝帝陵营造，可谓是兹事体大。新王朝甫一建立，首要的大事就是建都与修陵，一般汉朝皇帝在登基第二年就要为自己营造陵园。通俗来说，帝陵也就等于是帝王的阴间都城，是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都城是古代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指挥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国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与物化载体，帝陵则是反映这一情况的微缩景观，一个活跃在地下的王朝。因此西汉帝陵建筑基本上是仿照京城长安及其皇宫的形制布局修建的。西汉的帝陵与皇后陵位置，一般前者居西，后者居东。这与汉长安城中未央宫、长乐宫的关系相似。帝陵陵墓封土似皇帝的“正殿”，四周的墙垣犹如皇宫宫墙。陵园墙垣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如皇宫四门。陵墓居陵园中央，陵园四门中，正门在东，其形式近似于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在宫城中央、四面各辟一宫门、东门为正门的布局。

帝陵陵墓又分为地上和地下部分。地上部分除了以山为陵的霸陵外，均为人工夯筑的高大的覆斗形封土，是皇帝生前居住的高台宫殿建筑的象征，一般高约30米，底部方形，边长150—170米。其中最大的茂陵竟高达46.5米。封土规模反映了战国时代即已流行，

到秦始皇陵发展到极致的“以大为贵”的墓葬理念；地下部分则为墓室，即地宫，又称“方中”，深度与封土高度基本相同，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羨道，这一规制可以追溯至殷墟的商王陵墓。据文献记载，西汉帝陵方中用地一顷。墓室中又有殿堂形状的玄宫，放置皇帝葬具，主要有梓宫（珍稀木材梓木制作的棺材）、便房（仿照皇帝生前居住、宴饮场所）、黄肠题凑（中国从春秋至汉朝时的墓葬形制，为帝王、诸侯、少数重臣特有的一种椁具，一般为上万根黄肠木堆叠而成，从内侧看四壁全见木头故称题凑），奢华之极。礼制建筑分列前方和左右，陵邑居北；陵园平面均为方形，门阙在四面墙垣正中，四面辟门。

而由于长安城的营建有一个过程，因而反映在西汉诸陵的布局安排上也有所不同。高祖、惠帝时期，未央宫尚在建设中，帝、后均居于长乐宫，因而长陵和安陵的帝、后陵墓同在一个陵园内。汉文帝以后，帝、后分别居于未央宫与长乐宫，故此，自文帝修建霸陵开始到西汉结束，皇帝和皇后的陵墓便各自设置一座陵园。因为当时皇帝居于长安城中位置偏西的未央宫，而皇后居于偏东的长乐宫，所以，反映在陵区布局上便是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帝、后合葬同茔不同穴。后陵一般较帝陵为小，越到西汉晚期这种现象越显著。

在帝陵陵园附近，还有寝园和陵庙。前者包括寝殿和便殿，寝殿仿皇宫中的正殿而造，主要用于举行祭祀活动，便殿则存放皇帝皇后生前用过的衣物及葬仪时所用器物，以及为寝园官员办公场所。陵庙则专门为陵事活动修建，定期举办祭祀活动。文武大臣有重大事情也要参谒陵庙，如苏武从匈奴回到长安，当时的皇帝汉昭帝就让他去拜谒先帝汉武帝陵庙。作为西汉帝陵的一整套礼制建筑，寝殿、便殿、陵庙等非常重要。西汉奉行“日祭于寝，月祭于庙，四时祭于便殿”（《汉书》）的陵寝制度。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寝殿要摆放亡者的神座，“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要像奉生者一样，“日四上食”。便殿里存放皇帝生前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四时于此祭祀。陵庙放亡者牌位，每月要从便殿中取出皇帝生前的衣冠，到陵庙中祭祀一番。此外，陵庙每年还要举行25次祭祀，其中每季还要有一次特别隆重的太牢祭祀。

西汉帝后陵园内，围绕着封土四周还分布有数量众多、埋藏丰富的从葬坑。帝王不但生前尽享富贵，还要把物质享受带到陵墓中去。其中的随葬品可谓多不胜数，包括各种葬玉、印玺封泥、礼器、珠玉珍宝、金钱、车马器，还有陶俑、兵器、竹简、生活用具、食物等。尤其是景帝、武帝、宣帝几朝更是达到高峰。据《旧唐书》记载：“汉室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按照这一比例计算，西汉王朝历时210年，埋入皇帝陵墓中的财富便相当于7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从这些随葬品中，也可以得见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杰出成就，从其各代帝王陵陵园形

制与随葬品的变化中，也体现出西汉国力的兴衰起落、时代丧葬风俗的流变。

每座帝陵，除了帝后陵园，还会有大量的陪葬墓，有的多达六七十座，墓主多为皇亲贵戚、重臣功臣等人。据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考证：“这些陪葬墓一般分布在陵区东部和北部。如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宣帝杜陵，其东部均有不少陪葬墓，它们以穿过帝陵陵园东门的東西线为中轴，南北分布，这颇似汉长安城未央宫前诸侯朝谒之仪。”因为当时的未央宫是以东门为正门，帝陵陵园仿未央宫修筑，也以东门为正门；也有文献记载“未央宫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北门是百官、平民“上书奏事之门”，汉代又视未央宫北阙附近为“甲第”，不少权贵被赐宅于此。因此也有陵墓分布在帝陵之北。总之，这些如众星拱月一般的陪葬墓的分布，正是死者生前活动的写照。生前他们迁居于陵北或陵东的陵邑，死后就在陵北或陵东安葬，他们的都城生活又从地上照搬入地下。能够陪葬帝王，对于他们也是莫大的恩宠。这些陪葬墓在帝陵陵区的位置和规模，也说明了他们生前的政治地位，以及与皇室的亲疏远近。

从西汉帝陵的考古来看，修建帝陵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作为帝王的个人需求，而是上升到了巩固国本的国家战略高度。以刘邦的长陵选址为例，长陵选在离长安以北仅一水之隔的咸阳原，近邻秦朝旧宫咸阳宫，就包含着刘邦作为汉朝开国君主的深谋远虑。

首先，咸阳原东起泾渭交汇，向西止于今咸阳市兴平市，相对高出关中平原，且愈西去原势愈高。原上平坦开阔，土厚水深，道路辐辏，良田万顷，正符合所谓“龙势”。咸阳原南临渭水而北带泾河，可谓好水环绕，充分具备了聚气之条件。“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咸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西汉诸帝首选的陵域之地。刘邦选咸阳原最高点为陵寝所在，即雄踞咸阳原正对长安的位置上，其南距未央宫前殿仅10多千米，这种帝陵与都城南北相对的方位设计，也体现出将帝陵与都城作为“阴阳二界”统一体的观念。占据风水宝地的巍巍长陵，正如同刘邦这位大汉的开国帝王，以无上的气魄俯视着前朝宫阙，又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仅一河之隔的长安城，为西汉王朝的千秋伟业而殚精竭虑。

其次，刘邦初定天下之时，汉朝羽翼未丰，国力正在从长年的战乱造成的破坏中缓慢恢复，营造长陵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选在咸阳原秦咸阳宫旧址边，可以利用尚未完全毁坏的咸阳宫的大量建筑材料，为长陵营造所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长陵营造所需的建筑材料购买和运输的花费，减轻了国力尚弱的汉朝的国家负担。而且咸阳宫的建筑材料除了提供长陵营造，还可以通过渭桥进入长安城，支援正在兴建的未央宫，可谓一举多得。

刘邦将长陵选在咸阳原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借长陵营造之机，设置陵邑以

做京师屏障。西汉前期，威胁其政权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关东豪族；二是经常南下的匈奴大军。咸阳原正当长安北首，当时通往西北的两条重要交通线，都是从长安出发，渡渭水而逾咸阳原通往西北。帝陵建在咸阳原上，设置陵邑，迁徙大批关东豪族充奉，一方面将这些蠢蠢欲动、梦想复辟的六国旧贵族置于西汉统治者的严密监控之下，以除后患，他们的到来也为关中经济的恢复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当地人口的增殖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设陵邑并徙民是西汉政权缓解经济困顿、财政困难、人力枯竭的重要举措之一。另一方面大量人口迁居咸阳原，无疑为京师长安的北门户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南侵的坚强屏障。咸阳原五座陵邑和长安城东南的霸陵邑、杜陵邑，与长安城联系紧密，成为中国最早的卫星城市，正所谓“七星伴月”。这种在中心城市周围置建卫星城市的做法，是对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布局的重大突破。把帝陵视为京城的一部分，这在陵邑管辖上也有体现。这些供奉皇陵的陵邑先属太常寺管辖，后归属京兆尹，明显表现出与京城浑然一体之势。这样皇帝虽居幽冥，但并未远离京城，仍可以君临天下，庇佑汉祚。刘邦围绕长陵营造的种种设计，足见其雄才大略和长远眼光，使长陵不仅成为帝王千秋功绩的见证和夸示，更成为维护汉朝国家稳定的屏障和保证。

此外，帝王陵寝还是帝王在位时的国力兴衰、时代风貌以及帝王生活、性格的生动写照和具体反映，无论是其营造设计还是所出土的文物，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以在西汉帝陵中最为典型的阳陵为例，唯我至尊、皇权至上的设计理念在阳陵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西汉帝陵的设计标杆，从此奠定了西汉帝陵规制。从阳陵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国家的政治机构设置，御府坑中出土的“宗正之印”“大官之印”“甘泉仓印”等多枚铜印章与封泥，可以推测出汉朝中央政府多部门参与帝陵修建的事实。随葬的大量兵俑气势非凡，表情丰富；独具特色的动物俑形象生动，向人们展示着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堪称强大，兵强马壮，百姓富足，在帝陵中也能窥见“文景之治”时雄浑壮丽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气息。

又如汉武帝一生追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理想，其茂陵布局就体现了大汉王朝四海宾服的政治理想，也是刘彻倾力构建的大一统格局的重要成果。他在位期间，一心要征服匈奴，并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茂陵陪葬坑埋葬了无数珍宝，其中挖掘出的鎏金天马，造型与大小迥异于汉初杨家湾出土的陶马，明显以武帝时引进自西域大宛的天马为原型。征战匈奴需要有强大的骑兵，发展一支足以对抗匈奴的骑兵部队首先必须有数量充足的上乘战马，所以中央政府很重视马政，西域的优良马种不断引进长安。在征伐出产宝

马但又拒绝大汉以财物换马的请求，并杀害汉使的西域大宛成功之后，汉朝获得 3000 匹大宛的汗血宝马。因此，这一鎏金天马也直接表现和见证了武帝时尚武进取的时代精神。

帝陵陵址的选择还与昭穆制度及皇帝个人的好恶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另葬长安东南的文帝霸陵、宣帝杜陵。文帝由代王而继帝位，在位 23 年，死后入葬霸陵。文帝刘恒与惠帝刘盈同为兄弟，按昭穆制度父为昭，子为穆，刘盈为穆已葬咸阳原陵区，而同为穆位的刘恒只得另辟陵地。另外，文帝崇尚节俭，其葬因山为陵（在白鹿原断崖上凿穴），不起坟，因此霸陵便建在了长安城东南。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因巫蛊之祸一门败灭，刘询流落民间，就生活在杜东原上，后来被霍光等辅政大臣迎立为帝，宣帝即位后，对少时生活游玩的这片土地仍心怀眷恋，便将自己生前最喜欢的地方选做了自己永久的归宿之地。

如上所述，一座座的大汉帝陵，蕴藏着一个个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时代，展示了大一统大汉帝国的非凡气度和雄厚国力，也奠定了此后两千年来的帝陵文化传统。帝陵是可以不断探索历史奥秘的富矿，每座帝陵都是一本可以不断读出新故事的《史记》。这片辉煌的“东方金字塔”不仅是世人眼中一座座尚未开启的神秘宝藏，还蕴藏着大一统汉帝国的统治智慧、政治密码，一个王朝的兴衰流变之谜，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亘古流传的文化基因。巍巍帝陵，皇皇大汉，不只属于已经远去的历史，更属于今天和更远的未来。



西汉十六字方砖

上书“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践此万岁”，为皇家建筑专用。意为政治上大一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百姓不受饥饿流离之苦，如此才能千秋万代，帝祚永续。可谓尽得天时、地利、人和。十六字传递出西汉时期的重要治国思想，这块方砖也由此成为大汉帝国盛世景象的最好见证。现藏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